

# 图书阅读赋能传统文化教育

唐元元

在数字技术重构人类认知模式的今天,传统文化教育的现代转型已成为教育领域的核心命题。当短视频以15秒的碎片信息冲击深度思考,当算法推荐以“精准投喂”替代主动选择,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教育正面临着“形式繁荣”与“内涵空洞”的双重困境。而图书作为承载文明记忆的核心载体,其在传统文化教育中的独特价值,恰在于以“墨香”为媒,构建起从文本解码到文化认同的完整认知链条,为传统文化教育开辟出一条“守正创新”的新路径。从知识社会学视角看,传统文化教育的本质是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。布迪厄提出,文化资本通过“具身化”“客观化”“制度化”三种形式实现传承,其中客观化的文化资本以物质形式存在,图书正是最典型的客观化文化资本。一部《论语》历经2500余年,从简牍到帛书,从雕版到活字,从纸质书到数字文本,其物理形态的演变始终伴随文化内涵的增殖。这种“文本-载体-阅读”的三重结构,使图书不仅是知识的容器,更是文化基因的“活化石”。相较于短视频的“即时性满足”,图书阅读的“延迟性反馈”恰恰为传统文化的深度解码提供了时间维度——读者需要逐字推敲《诗经》中的“兴观群怨”,需要在《史记》的“太史公曰”中体会史家笔法,这种“慢阅读”过程本质上是文化认知的“具身化”过程,读者通过与文本的深度

互动,将客观化的文化资本转化为个体的认知能力与价值观念。

图书阅读对传统文化教育的赋能,首先体现在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建构上。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含哲学思想、伦理规范、艺术审美、科技智慧的复杂系统,其教育需避免“碎片化”陷阱。以“儒家文化”为例,若仅通过“仁义礼智信”的标语式传播,容易沦为抽象概念的简单罗列;而通过阅读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等原典,读者能在“格物致知—诚意正心—修身齐家”的逻辑链条中,理解儒家伦理的内在结构。这种系统性阅读不是对经典的机械复制,而是通过“文本细读”实现文化基因的现代转译。

其次,图书阅读为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情感共鸣的审美通道。李泽厚提出“情感本体论”,认为文化认同的深层动力是情感联结而非理性认知。图书作为“有温度的文本”,其纸质触感、墨香气味、版式设计共同构成了“阅读仪式感”,这种仪式感本身就是文化情感的载体。以《红楼梦》为例,当读者抚摸线装本的封面,翻动泛黄的书页,看到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”的题诗,文本的物质性与精神性产生共振,读者的情感体验从“理解”升华为“共情”。这种共情能力的培养,恰是传统文化教育的关键——它不是要读者记住多少典故,而是要让他们在“大江东去”的豪迈中体会家国情怀,在“采菊东篱”的闲

适里感悟生命智慧。

图书阅读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革新,还体现在阅读共同体的构建上。费孝通“差序格局”理论在阅读场域中呈现出新的形态:个体通过阅读形成“自我认知圈”,通过分享阅读心得扩展为“社群交流圈”,最终通过公共讨论构建“文化认同圈”。近年来兴起的“经典共读”活动,正是这种阅读共同体的实践样本。北京师范大学“《论语》研读小组”连续十年组织大学生共读《论语》,成员通过撰写读书笔记、举办读书沙龙、开发“论语与现代生活”课程,将个体阅读转化为群体文化实践。这种“阅读—讨论—实践”的闭环,使传统文化教育从“单向灌输”转变为“双向建构”,读者既是文化的接受者,也是文化的阐释者与传播者。

在技术加速迭代的今天,图书阅读并未因数字阅读的兴起而式微,反而在“纸质书+数字资源”的融合中获得新的生命力。电子图书的“超文本链接”功能,使读者能一键跳转至《说文解字》解读者僻字,通过3D动画复原古代器物,这种“沉浸式阅读”既保留了传统阅读的深度,又增强了现代阅读的交互性。上海图书馆“数字人文实验室”的实践显示,将《四库全书》等古籍进行数字化标引后,读者不仅能阅读原文,还能通过关键词检索分析清代学术思潮的演变,这种“数据化阅读”使传统文化教育从“

定性描述”走向“定量分析”,为学术研究与大众教育提供了双重可能。

从本质上说,图书阅读视域下的传统文化教育,是一场“以文化人”的精神实践。它不追求“立竿见影”的教育效果,而是通过文本的深度浸润、情感的缓慢积淀、认知的逐步建构,让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真正融入当代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体系。当读者在《诗经》中读懂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”的生命诗意,在《孙子兵法》中悟透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和平智慧,在《本草纲目》中感受“医乃仁术”的职业伦理,传统文化便不再是“博物馆里的文物”,而是“活在当下”的精神力量。

图书作为文明的“时间胶囊”,始终在记录与传递中完成文化的“基因重组”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坚持图书阅读视域下的传统文化教育,既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,也是对教育本质的回归——因为真正的教育,从来不是知识的简单堆砌,而是通过与经典的对话,让文化的血脉在代际传递中生生不息。



## 自我囚禁的爱情殉道者

——读安德烈·纪德小说《窄门》

欧阳玲燕

安德烈·纪德的中篇杰作《窄门》远非一个简单的“爱而不得”故事。它以冷峻而富有张力的笔触,剖析了一颗被信仰与性格枷锁禁锢的灵魂——阿丽莎·比柯伦。她亲手将自己囚禁于窄门之内,成为一场自我献祭的悲剧主角。

故事背景设定于20世纪初的法国。比柯伦家的阿丽莎(长女)、朱丽叶(次女)、罗伯(幼子),与表亲杰罗姆(父亲早逝,寄居舅家)及牧师之子阿培·服提叶,五个年龄相仿的孩子

在相似的教育与环境中成长,一同嬉戏、读书、做弥撒。阿丽莎美丽娴静、知书达理,与杰罗姆青梅竹马,相爱顺理成章,备受亲友祝福。

十几年过去,孩子们长大,各自步入人生轨道。阿培热烈追求朱丽叶遭拒后迅速振作,终成轰动一时的作家;朱丽叶曾暗恋杰罗姆,走出失恋后,嫁给健康、殷实且深爱她的爱德华·台西埃,生儿育女;罗伯性格软弱,变卖祖产后追随姐夫经商。唯独阿丽莎与杰罗姆的爱情深陷泥潭,进退维谷。

阿丽莎的悲剧根源深植于家族阴影:其母吕西的私奔丑闻如同诅咒,尤其透过杰罗姆母亲(其姨妈)的鄙夷目光,深深烙印在她身上。酷似母亲的美貌非但不是祝福,反成耻辱象征,滋生了她对世俗幸福根深蒂固的不确信与恐惧。她沉溺忧郁,感官钝化(不闻花香,不见美景),无法静心阅读与祷告。她放任自己失去生活热情,并将阴郁情绪强加于人。她以“真爱无需形式”拒绝订婚;以“牺牲”之名将杰罗姆推给妹妹;复以“学业”为盾构筑疏离之墙。这些看似高尚的举动,实则通过书信、日记等“情感炮弹”,将

其意志强加于依赖她的杰罗姆,确保在情感关系中的绝对主导。貌似满纸思念,实际上不过是阿丽莎内心怯懦、不敢直面真爱的掩饰。她的自我献祭,是以杰罗姆一生的爱情与幸福为祭品,将其拖入永恒的迷茫与痛苦,本质上并不纯粹。最终,她戴着自制的精神镣铐,走向幻灭与死亡。阿丽莎写给杰罗姆的信件充满神学辩证,如“我们生来不为幸福,而为圣洁”。这些裹挟宗教权威的句子实为情感枷锁,印证了语言如何成为精神暴力的工具。

小说采用杰罗姆视角叙事与阿丽莎日记相结合的“双声部”结构形式。杰罗姆的回忆笼罩着理想化滤镜,如形容她“微笑时忧郁的神情像波德莱尔诗中‘太短的夏日辉煌’”。而阿丽莎的日记却揭示冷酷真相——“当他靠近,我连祷告都无法继续……唯有远离才能虚构圣洁”。这双重叙事形成巨大张力,撕开阿丽莎“圣徒”表象,暴露其内在的混乱与自欺。两种声音的撕扯,让读者在文本裂隙中窥见爱情本质的不可抵达。纪德将景物化为心理镜像:阿丽莎死后,杰罗姆凝视她房中枯萎的菊花——这些曾被她斥为“俗艳”

的花,实则是压抑欲望的牺牲品;而朱丽叶果园里“缀满沉甸甸的葡萄”,则暗喻世俗生命力的丰盈。

“窄门”出自《马太福音》“你们要努力进窄门”的训诫,纪德将其异化为阿丽莎的精神牢笼。她将“窄门”解读为“排除世俗幸福的道德碾压机”,幻想通过自我压缩、剔除欲望以挤进天国。这彻底悖离了宗教爱人、宽恕的本意,更是对象征意志考验的“窄门”精神的极端曲解。此种对宗教符号的病态重构,使文本弥漫着神性压抑人性的窒息感。“窄门”非物理之窄,实为精神炼狱。

纪德曾言,《窄门》意在批判某种信仰狂热。阿丽莎的悲剧不在被迫牺牲,而在她主动选择受难,以杰罗姆的爱情与人生为祭品,以痛苦的确定性对抗生命的虚无。通过《窄门》,纪德展示了人类在道德与情感双重压力下,于狭窄人生道路上寻找方向的困境。他将自身矛盾(身为同性恋者却娶妻为妻,痛恨清规却终生挣扎)注入文学基因。这种撕裂感使《窄门》超越爱情悲剧,成为人类精神困境的寓言。当读者愤懑于阿丽莎的“自我绑架”时,纪德早已在文本中埋下警示:所有通往天国的窄路,皆需以尘世幸福为路砖。窄门之后,未必是天国,亦可能是自我堆砌的虚无。那道门是否值得挤入——答案永在叙事的迷宫中飘散,如同阿丽莎日记中被风卷走的残页。

纪德拒绝提供答案,却以艺术形式开辟思辨战场,留下窄门之外的永恒诘问。



《窄门》 纪德 著